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美)布劳

商务印书馆

Peter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35 Berrue Circle, Piscataway, New Jersey 08854.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 Transaction 出版公司 2004 年第二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美)布劳著;李国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 - -

I. ①社… II. ①布…②李… III. ①权力—研究
IV. ①D0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88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美〕彼得·M. 布劳 著

李国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 - -

2011 年 月第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1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社会学名著译丛

总序

学术名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的。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向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什么“顶峰”之类。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真理,它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简言之,这是一种有用即被采纳的实用理路。因此,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就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里譬如几年、几十年就会被超越、被颠覆。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

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这样说并不否认社会研究也有其方法论的方面,而是说它与意志论和形而上相比只居次要地位。不消说,后两方面都与研究者本人的传承、学识、洞见、表达能力等学术修养方面有殊多关联。这也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家及其文本居于核心地位的存在理据。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科学并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摹本几乎成为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构成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统一科学观要求社会科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仅把经验事实视为思想的源头并减少对经典关注的理由,因为经验主义在关注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选择事实所依据的启示性原则。这种启示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本质上先于经验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的探究毫无疑问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但同样明确的是,社会研究除了经验事实之外还要关注能对经验观察提供启示的那些原则,即还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性思辨。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来说,社会学就是这样地处于经验论与先验论、实证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张力中,因为它所要研究的是由人们的行动结果所造就而成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外在的第一级表层物理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人的第二级深层意义结构;它毕竟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且还是由意义动机引发的行动所构成的现象,即社会的物,亦即由观念构成的实在。职是之故,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在经验观察、量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

展,而且在标志人类理智成长的社会理论领域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造就成群星璀璨、相映成辉的繁荣景象。

由这些大家阐发的不同启示性原则之间也有歧见,因为每一种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原理对外物的一维解释,只要坚持首尾一贯性做到逻辑自洽,就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又不能自诩是对外物穷尽无遗的把握。这些启示性原则并不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种在时间中流动呈线性累积的进步特征,而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约定。故科学研究越是抽象化、一般化,其具有的累积性特征就越少。这些启示性原则与其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标准,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关于这一标准的最低程度的共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仰赖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相对一致的利益、旨趣和偏好的支撑,表现了个人从审美上、哲学上、诠释上、观察等方面上对作为现代性之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领悟的表意能力。归根到底,作为这些启示性原则之结晶的经典,类似一种顿悟式的人类理智能力的偶然性(个体性)贡献。它或由于对人类精神状态和主观倾向的睿智洞察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之穿透力,或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敏锐性重构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及其规律的揭示,或由于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评判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而成为经典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中心,进而构成社会理论中具有范式般指导意义的三大传统,为人类理智在社会领域继续向上攀登奠定了基础。

人们通常把这些大家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事实所表现出的想象能力、穿透能力和批判能力直白地称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意即经由一代代大家们累积起来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包括他

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愫,这些是社会学的“根”或“灵魂”。社会学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的学科意识,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灵魂,无异于取消了自己存在的理据。这里强调大家及其文本在认识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目的在于克服时下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只罗列经验事实不做理论思考的流弊,避免由此导致对社会现象的单面、一维的理解。对社会学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哺育了几代学人,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提升汉语学界学术水准居功至伟,海内外华人学界同仁有口皆碑。现今又专门辟出社会学名著译丛系列,这一举措对于充实和扩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模效应可谓锦上添花,而对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研究水准不啻雪中送炭,可说恰逢其时。

谨以上述感怀序写于丛书付梓之际,并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勉。

苏国勋

于 2006 年岁末

献 给 泽 娜

目 录

第二版引言·····	1
序·····	15
各章主要内容·····	17
导言·····	35
第一章 社会交往的结构·····	49
第二章 社会整合·····	77
第三章 社会支持·····	113
第四章 社会交换·····	152
第五章 权力的分化·····	188
第六章 期望·····	225
第七章 群体中变化和调整的动力学·····	258
第八章 合法化和组织·····	297
第九章 反抗·····	329
第十章 复杂结构中作为媒介的价值·····	368
第十一章 亚结构的动力学·····	406
第十二章 辩证的力量·····	443
人名索引·····	478

主题索引·····	487
译后记·····	503

献 给 泽 娜

第二版引言

彼得·M. 布劳

从本书首次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社会学理论化取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二版的这个引言中,我希望讨论一下我的理论观点所发生的变化。vii

对支撑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过程的微观社会学分析通常不同于对社会和社区中的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宏观社会学分析。在本书中,我集中于对支配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和不平衡过程的微观社会学分析,因此使用这种分析作为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某些理论思想的一个基础。

有一个隐含的假定,认为宏观社会学理论建立在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这是我已经开始怀疑的假定。我现在的假定是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分析包含着不同的理论方法并使用不同的概念。它们使相当不同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视角成为必要,尽管这些视角不能直接相互转化,但绝不是相互矛盾或互不相容的。在这一版的引言中,我将首先解释我是如何对本书所提出的交换理论产生兴趣的;其次,简短地勾勒一下我近期发展的宏观结构理论的主要观点;最后,对这两个理论系统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我在三十多年前最初萌发了支撑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思想，当时为了博士论文我正从事一项对政府公务员的个案研究。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两个公共机构的非参与性观察。从对所研究的一个法律执行机构进行观察伊始，我就注意到同事们经常就职责问题相互咨询。尽管官方规定要求，遇到问题的法官应该向主管咨询建议而不是向同事咨询，但是在他们工作的大办公室中我总是看到他们成双结对地忙于讨论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午餐时间充斥着对工作问题的讨论，包括一个官员告诉其他人他在一个事例中所遇到的有趣问题，或者某人征求其他人关于如何最好地处理一个复杂问题的意见。非正式咨询这种惯例——它是被禁止的，但却被容忍——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它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我把这种交易概念化为社会交换，每个人从中获得某些东西的同时也支付一个价格。一个官员在没有将他或她的困难不得不暴露给主管的情况下获得了帮助，他给予咨询者以尊敬作为回报，这隐含在对建议的请求中。反复出现的这种情况提高了另一个人的非正式地位，其代价是花费时间和精力给他人提供建议。

我对政府官员的研究受到了默顿(Merton)的启发，他的讲座向我介绍了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理论；并且也受到了我对工作群体中非正式关系的研究兴趣的激励，在阿伦斯伯格(Arensberg)关于产业社会学的课程上我已经研究了工作群体。我的目标是将在对工作群体的经验研究中形成的程序应用到对政府科层制中的官员的研究上。当研究的结果后来以《科层制的动力学》为名出版时，霍曼斯(Homans)在对这本书的评论中指出，这本书的标题

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它与其说是关于科层制的,不如说是关于工作群体中的非正式关系的。这个评论对我产生了一个震动性的影响,并且影响了我随后几年的研究方向。但是在那之前,我的分析明显激发了霍曼斯的思考,并且他的著作反过来也影响了我。

当霍曼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客座讲座时,在1950年代我是那里的初级助理教授,非常令我吃惊的是,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详细地引用我关于咨询的讨论并把它作为他所介绍的分析的基础,这个分析是他的第一篇关于社会交换的论文(1958年)。他对我的分析的关注以及他随后对交换理论的详细阐述(Homans, 1961)重新点燃了我对社会交换研究的兴趣。

社会交换概念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我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原型,因此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过程或者说是社会生活的质点(*particle*)。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研究的许多主题在同一类属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社会性产生的个人特征。人们的态度、投票、教育经历和职业毫无疑问是以社会为条件的,并且通常是指向其他人的,但是这些因素本身涉及个体的行动和思想,而不涉及社会过程。社会交换不同于这些变量的地方在于它直接与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换过程相关,我们集中关注对自我行为的依赖,不是自我先前的条件作用、背景、经历或特征,而是密友的行为,它反过来取决于自我的过去和预期未来与密友的互动。我与霍曼斯理论的主要不一致深植于交换的独特的社会特征这种观念,这意味着它不能被还原为支配个体动机的心理学原理,或从支配个体动机的心理学原理中推导出来,这是霍曼斯所致力于的目标。根据我的观点,交换理论的目标是通过分析 ix

构成交换的互惠过程,根据交换原理来解释社会生活,而不是根据动机和隐含的心理学原理(就像心理学家的目标不是根据潜在的心理过程来解释心理的倾向和动机一样)来解释个体为什么参与特定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学中,不仅待解释的术语(我们试图解释什么),而且用来解释的术语(我们用什么术语来解释它),都是社会性的。与霍曼斯形成对比——他是一个心理还原论者(或者说,如同他倾向于把自己所称为的那样,是一个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我假定社会结构(并且,实际上是所有的由亚单位构成的结构)具有不能根据亚单位的属性来理解的突生属性。

我对社会交换的兴趣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研究的主要兴趣是提出系统化的理论,交换的观念本身适合于发展像经济学理论模型所显示的那样的严密理论。实际上,霍曼斯的分析是社会学中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演绎理论的少有的努力之一,我与他的心理还原论的分歧并没有妨碍我对他发展严密的社会理论的努力的钦佩。经济学理论中已经富有成效的许多概念适合于在严格的经济学领域之外的社会学分析中使用。例如,边际效用的概念可应用于大量的社会现象,比如,当已经从许多其他人那里获得了赞同时,社会赞同的意义就会不断下降。经过适当的修改,在其他学科已经被检验的理论性原理可以作为建构社会学理论的砖瓦。

交换理论对我具有吸引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希望它将为微观社会学分析和宏观社会学分析之间提供一个连接,因此帮助我提出一个包含这两方面的社会理论。社会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

x 问题是微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和表现大型集体特征的制度之间的

关联,近些年该问题再次获得了相当大的注意。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锻造这种连接。首先,我提出一个关于交换过程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然后,我试图用这个理论作为建构关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在对交换的微观社会学分析上比在向宏观社会学理论的过渡上更为成功。我的理论取向之所以从试图在微观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转变为在微观社会学理论和宏观社会学理论上采用不同的视角,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的社会学取向从微观到宏观的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我的经验研究中,然后在我的理论分析中。我的大量经验研究工作涉及正式组织。一开始,我最感兴趣的是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的更广阔的问题,但是我只能推理性地处理它们,因为来自个案研究的资料更适合于分析雇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而不适合于研究组织特征的相互依赖,后者需要对大量不同组织的比较。为了直接研究组织结构问题,在1960年代我决定牺牲透彻的个案研究的深度,以获得更大范围的对组织的定量研究。我完成了一系列这样的研究。每一项研究都涉及对既定类型——职业介绍所、大学或者工厂——的几十个或者甚至几百个组织的调查,并且分析描绘了这些组织正式特征的相互关系:它们的规模、劳动的分工、权威的等级、机器技术等等。我的调查从对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组织的个案研究到对科层制的正式特征的定量研究的转向反映了上面所提及的霍曼斯对我第一本著作评论的意外影响。

如同已经指出的,尽管我对理论自始至终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直到几年前我的大部分出版物都由调查研究的专题论著构成,这

本关于交换的著作是明显的例外。然而,我在芝加哥大学,后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定期地教授理论课程,包括一门关于创建理论之原理的课程。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兴趣于演绎理论和科学哲学家——尤其是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1953)和波普尔(Popper,1959)——对这个主题的分析。在我的关于建立演绎理论的原理的讲座中,我越来越对能够说明这些原理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缺乏感到丧气。我对建立演绎理论日益增加的兴趣提供了某种激励,而在荷兰高级研究机构的休假期为我提供了努力建构这样一个宏观社会学理论的机会(Blau,1977)。我将举几个这方面的概念和定理的例子来说明宏观结构视角和本书中关于交换的微观社会学视角之间的巨大差别。

我所发展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探索的主题是诸如整个社会或社区这样的大型人口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单位是这些大型的集体,而不是个体、两个人或者小群体。我的理论是关于结构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结构,而不是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结构,我用社会结构来指涉人们客观位置和关系上的差异,而不是神话或婚姻规则;但它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局限于经济上的差异,而是包含人们之间影响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种族上的、教育上的、职业上的或宗教上的。不同社会位置的内容——例如,天主教和新教信仰之间——被认为是文化结构而不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我用社会位置的结构来指涉人们沿着不同线路的分化,尤其是指涉他们在各种维度上的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分布,例如,宗教同质性(不管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民族异质性的或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因为每个人都占据大量的